

反讽实践:重建“结构”社会工作

——来自“新古典社会学”的启示

严骏夫

(华东理工大学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0237)

摘要:20世纪70年代以来,结构社会工作在不断扩大影响力的同时却遭遇着边缘化危机:随着新保守主义的势力扩张,结构视角在政治层面与自由主义为基础的体制格格不入。近年来通过重拾结构视角所建立起的“批判反思实践”日益勃兴,但尚未有效回答其自身的方法论基础、界定社会工作者的使命。文章旨在通过呈现西方社会学批判分析传统所面临的危机,与塞勒尼等人试图重建批判性社会科学的努力进行对话,梳理作为方法论的“反讽”概念与当代知识分子使命,尝试总结新古典社会学对社会工作理论的关联性启发,以此为重建结构社会工作提供洞见。

关键词:结构社会工作;新古典社会学;反讽实践;批判性话语;知识分子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17)03-0115-07

DOI:10.14134/j.cnki.cn33-1337/c.2017.03.013

严骏夫.反讽实践:重建“结构”社会工作[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7(3):115-121.

Irony Practice: Reconstructing Structural Social Work: Enlightenment from Neoclassical Sociology

YAN Jun-fu

(School of Social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237, China)

Abstract: Structural social work has been expanding its influence while experiencing marginalized crises since 1970s: with the expansion of neo-conservatism, the structural perspective is incompatible with the liberal-based system at the political level. In recent years, the “critical reflection practice” established through the reunification of the socialist tradition of social work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sperous, but it has not been possible to answer the question of legitimacy in its own theory.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reflect the crisis of the traditional sociology by analyzing the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 and to try to reconstruct the critical social science by talking with Iván Szelényi and others to sort out the concept of “irony” as a methodology and the mission of contemporary intellectuals. Under the inspiration of relevance of classical sociology and social work, this paper provides insights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work.

收稿日期:2017-02-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体制改革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16ZDA078)

作者简介:严骏夫,男,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工作与社会组织研究。

Key words: structural social work; neoclassical sociology; irony practice; critical discourse; intellectuals

一、结构社会工作的焕新与式微

社会工作与传统的社会科学以及实践学科的重要区别在于,它的专业目标是通过改变社会环境,使之更加有利于人与社会克服障碍、获得发展^[1]。然而,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体系中结构视角迅速衰落,以案主为中心的实用主义范式开始占据上风。这种微观临床实务理论的明显缺陷在于其所提供的解决方案难以跳出情境主义的问题界定框架,难以实现社会结构问题的批评与改进。因此,近年来国内外社工学者不断发出重返“社会”的呼声,建构“以中国为中心”的社会工作理论体系这一学术使命也开始引起专业共同体的重视^[2]。

长久以来,社会工作理论中的结构视角被过分地忽视了。按照迈克姆·佩恩对社会工作理论三大传统^①的划分,社会工作的结构视角,或称之为“结构社会工作”范式主要延续了社会主义传统,即希望经由结构性层面的改变而推动社会变迁和提升人们的福祉。结构社会工作以批判作为其理论和实践的核心,致力于回应社会不平等问题,促进基于社会正义、平等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社会改良。结构社会工作在一般意义上属于激进阵营,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与“激进社会工作(radical social work)”^②的部分内含有重叠。

然而,自诞生以来,结构社会工作始终游走在焕新与衰败之间。20世纪70年代以来,通过重拾结构视角所建立起的“批判反思实践”日益勃兴。1975年 Baily 和 Brake 的《激进社会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肇始了结构视角的兴起,该书挑战了基于个人改善和限制性的社会改良理论以及传统社会工作的霸权。在20世纪70年代,结构社会工作如日中天,基于结构视角的社会工作实务模式也不断涌现,例如“批判社会工作”“马克思主义社会工作”“政治社会工作”,它们均从政治上的社会主义出发,希望经由结构变迁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号召社会工作重拾其历史使命,把个人苦难和社会环境及社会结构的不公正勾连起来,通过社区为本的综合干预策略来促进社会进步。例如,加拿大学者罗布特·穆拉利^[3]所倡导的“结构社会工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等进步思想传统,对资本主义的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批判,进而重焕了社会工作的激进传统。澳大利亚学者 Pease 和 Fook^[4]将澳洲诸社会工作学者从后现代主义角度出发对社会结构问题的批判论点总结为“转型社会工作”,同样把社会结构的转变当作社会工作的核心命题。

然而,结构社会工作在不断扩大影响力的同时始终面临着危机:随着新保守主义的势力扩张,结构视角在政治层面与自由主义为基础的管理体制中格格不入。在社会工作专业领域内,由于无法在实务中得到施展,结构社会工作也遭受猛烈抨击。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即便在英国和澳大利亚,结构社会工作被给予了较高的重视程度,但在美国和其他展开社会工作实践的国家里,结构社会工作始终被边缘化,甚至一度处于沉寂状态。

与其说是专业发展危机,毋宁说,当代结构社会工作需要面对的关键问题是:在实用主义与新管理主义的夹击之下,结构社会工作能否/如何建构起自身的方法论基础,并且重新界定社会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实际上,结构社会工作的式微,深之植根于当代西方社会学,尤其是社会学中的批判分析传统所

①第一个传统是注重实效的传统(pragmatic tradition);第二个传统是治疗学的传统(therapeutic tradition),主要关注那些个人或社会的问题;第三个传统是社会主义的传统(socialist tradition),这个传统关注改革、社会批判以及在群体层次上进行干预,以帮助那些社会弱势群体或受压迫的人。

②台湾地区亦翻译为“基变社会工作”。

面临的危机。随着国家社会主义^①的瓦解,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actually existing socialism)的残酷和苍白使得“结构—批判”视角的观点失去了光泽^[5]。

本文的旨趣在于,通过呈现西方社会学之批判分析传统所面临的危机,与塞勒尼等人试图重建古典社会学基础观点的努力(即“新古典社会学”)进行对话,为重建结构社会工作提供洞见。因此在下文中,笔者将首先概述古德纳等人关于西方社会学批判传统面临危机的论点,接着呈现塞勒尼“新古典社会学”的方法论基础以及重建批评传统的路径,最后尝试总结新古典社会学对结构社会工作的关联性启发。

二、丧失批评想象力: 西方批评社会科学的生与死

(一) “实证主义”与“批判视角”边界的消解

在《西方社会学面临的危机》一书中,阿尔文·古德纳^[6]指出,20世纪实证主义社会科学与批判性社会科学之间的分歧点源自对社会主义可能前景的判断和预期,亦即,社会科学家们是如何衡量社会主义的现实性与可能性。一方面,20世纪的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倾向于将他们对“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诸多诟病的批判转换为对“资本主义”的无条件接受与维护,成为“单向度的人”;另一方面,批判性社会科学以“真实社会主义”^②现有观点为基础展开论述,建立理想社会模型。在古德纳看来,这两种西方社会学逐渐失去了曾经关于社会主义现实性与可能性之间富有理论生产力的要素,即由“分歧”转向“分裂”,成为两个学术话语体系,“要么是对迟钝的现实的片面强调(实证主义),要么则是对抽象的可能性的片面强调(批判性社会科学)”^[7],使得西方社会学失去了任何批评的维度。

(二) “批判性话语”与作为“新阶级”的知识分子

更重要的是,古德纳认为西方社会学批判传统的真正危机植根于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转变。批判性观点的发声者正在消亡,曼海姆所谓的在社会上无所依附的知识分子如今掌握着文化合法化的手段(means of cultural legitimacy),对“批判性话语文化”进行着垄断,构成一个可以施展权力的“新阶级”。

“批判性话语文化”是知识分子阶级身份的基础,它被定义为一套历史演变下来的规则,是一种话语的基本原则:它所关心的是对其言论的正当化;它的正当化方式并不是通过追求权威,而是通过仅仅依靠提出观点就使听众自愿接受。

在西方,“批判性话语文化”被客体化为“文化资本”,它以各种凭证为表现形式,而且通过专业主义成功地转变为新的意识形态。古德纳指出,西方知识分子作为新阶级在社会事务中的分量日益增加,新阶级的成员成为现代国家、经济体、大学以及其他公共部门和经济部门运转的关键组成部分,新阶级的成员处于一个“不用担心之际报酬”的位置上。

(三) 重建批判的出路: 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

即便指出了西方社会学批判传统的危机,但古德纳还是尝试分析了社会学的批判传统重建可能性。他指出,社会学的激进潜力,在于它对自反性(reflexivity)的坚持,即以知识分子的“批判性话语文化”作为武器,来针对知识分子自己。在自反性的过程中,行动者会将自身的利益和推理方式暴露在自我批判性的审视之下,如果知识分子群体能够致力于将自反性作为社会行动的第一原则,即便是利己主义的社会科学家,也能够提出关于更理想的社会批判性观点。

^①此处专指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经济体制,与作为社会发展最高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无关。

^②在他们看来,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间在东欧和中欧存在的社会主义类型并不是“真实的社会主义”,而是不完善的社会主义,甚至是国家资本主义。

三、新古典社会学:重建批判性社会科学的一种尝试^①

西方社会科学应该放弃批判传统和激进的结构视角吗?伊万·塞勒尼(Iván Szelényi)认为,第二次“大转型”^[8]之后,社会学所面临的危机反而为社会科学批判视角重新焕发活力提供了机会。他号召当代知识分子重访古典社会学并承其衣钵,借用“反讽性的自我反思”所构成的批判性权力武装自身,对古典社会学的基础性观点进行一番重构,以此重建人们对“现代性”的理解。

(一) 作为方法论的“反讽”

克尔凯郭尔将苏格拉底与浪漫派、黑格尔的思想进行对比之后,逐渐明确了作为苏格拉底哲学核心的“反讽”概念的历史意义^[9]。但克尔凯郭尔的浪漫反讽只是一种审美反讽,强调反讽主体调整行动者心境,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讽主体则是“一种更积极的实践主体,不仅仅依靠性情和姿态的改变调整主体的心态,而是要通过实践行为实际变革客体世界来强烈地表达一种对经验现实的反讽”,是内含着审美维度的“反讽实践”^[10]。塞勒尼正是在反讽实践的意义上使用这一词汇,并将“反讽”作为新古典社会学方法论的认识论基础。

塞勒尼等人将“新古典社会学”与“新古典经济学”进行比较后认为,后者只假定一种单一的、线性的社会发展模式和理性的人类行为模式,前者需要与后者区分开来,就需要开拓批判性社会分析的领域,用“反讽式”的方法来“提出问题”“探究问题”。因此,“反讽”思维的对立面即“单向度的承认和理解、不加反思的接纳、不怀疑的执行”。

典型的反讽形式是,存在一个需要被回答的问题,“听众”的头脑中事先假定了一个平淡无奇的、视之为常识的答案;而一个好的反讽者,需要给听众提供出其不意的答案,而这个答案需要与听众原先在头脑中存在的那个答案同样具备合理性。

亦即,“反讽”总需要在自我讽刺的同时进行论证和言说,因此总是在自反性的模式中得以施展,致力于反讽的行动者,在他/她开始分析之前,总是要将自己的价值观、知识库存“悬置”起来,并且将“他者”的观点视为有效。只有理解他自身的价值(观点)与他者的价值(观点)是相互关联的,研究(话语)才能有效开展,换言之,这些价值(观点)只有在相互的关系中才有意义。这就是反讽方法的自发性前提假设(the reflexive premise of the ironic method),或称之为“关系性的分析”。

反讽分析的目的,其实就是通过描述和构成各种立场及决定机制的关系,向听众展示这些立场及其决定机制所具备的暂时性特征。反讽分析唯一必须做的事,就是劝说其他人相信,还有一系列其他可能的解决方案,简言之,反讽分析即是为了跳出现实性与可能性的二元对立,接受“多重事实的可能性”。

(二) “反讽知识分子”的使命

塞勒尼等人在克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三种知识分子^②的类型学知识的基础上,通过植入韦伯关于“术士”(magician)知识分子的理想类型,以描绘社会科学调查场域知识分子类型学为切入点,试图找到知识分子的合理定位,以此为重建批判性社会科学找到行动载体。

按照“批判性”与“肯定性”(建立话语合法性的取向)、“经验性”与“先验性”(形成知识的过程)这两对范畴,塞勒尼等人建立了社会科学调查场域的四分象限,“爱说笑话的人”“教士”“术士”和“哲学王”分别置于四个顶角(见表1)。

^①在当前美国主流社会学的众多学派中,至少存在两条不同的重建社会学批判主义的取向,它们都自称重访古典社会学并承其衣钵,却也在关键问题上有着不同进路。其中一条倡导“新古典社会学”的建立(Neoclassical Sociology),以伊万·塞勒尼(Iván Szelényi)为主要代表;另一条布洛维将其概括为“社会学马克思主义”(Sociological Marxism),以卡尔·波兰尼为集大成者。详见: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

^②即教士(priest)、哲学王(philosopher king)和爱说笑话的人(jester)。

表1 社会科学调查场域中的知识分子类型

	批判性	肯定性
经验性	爱说笑话的人	术士
先验性	教士	哲学王

资料来源: 吉尔·伊亚尔:《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 吕鹏, 吕佳龄,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2008年版。

“教士”通常是批判性的, 因为他需要发展出一套乌托邦式的观点, 描绘出一种更加合理、在道德上更加优越的社会, 然后与现实社会形成反差; 与“教士”认知方式比较接近的是“哲学王”, 即代表了作为统治者的知识分子, 试图把头脑中理想的施政方针强行带到人间。在塞勒尼看来, 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新古典经济学家即是当代的“哲学王”; “术士”受到“客户”的严格限制, 从而必须实现他们的特殊请求, 即通过实施他们复杂和深奥的专门知识(复杂模型和分析技术)来使自身尽量不受客户要求的约束, 在美国, 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尤其是实证科学取向)即属于此类知识分子。

“爱说笑话的人”在对待论证技术方面与“术士”保持一致, 即指向具体性的、经验性的材料; 在建立话语权威的策略上则和“教士”类似, 即通过批判倡导改变。与“教士”不同的是, “爱说笑话的人”生产出的是反讽性的批判, 即通过指向经验性, 让听众产生内在批判; 与“术士”不同的是, “爱说笑话的人”不需要对特定客户做出特定回应,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 “爱说笑话的人”的主要任务是让听众感到震惊, 去明确表达公众尚未想象到的画面, 或者去说出公众不愿意承认的事实。

在新古典社会学看来, 重建批判社会科学需要“爱说笑话的人”, 抑或称他们为“反讽者”。他们作为批判理论家的任务, 是在经验上描述和评价与社会发展有关的可能性替代规律, 去展示已经存在的结构并非不可避免, 去指出社会行动的开放性, 去阐明这些行为方式的代价和后果, 并且在不假定哪一个选择是“正确”或“合理”的情境下, 承认现实的多维可能。

四、与新古典社会学对话: 对社会工作反思实践的反思

(一) 将“结构”带回到社会工作实践的中心

社会学和社会工作是19世纪社会大变局时代诞生的双生子。在前两波社会自我保护运动中, “市场化进程”并没有偃旗息鼓, 反而在“历史的终结”的叙事下卷土重来。布洛维指出, 第三波市场化带来了反对自然(包括土地、环境等)商品化的对冲运动。拆迁抗议、业主维权、环保运动实际上都是这种对冲运动的具体表现形式。土地和环境等自然资源的市场化, 带来的不仅是经济上的不可持续和破坏、社会结构的裂痕, 更有可能造成人类共同体生存基石——生态系统的彻底毁灭。布洛维强调, 三波市场化浪潮并不是从一种虚构商品过渡到另一种, 而是齐头并进。第三波市场化的降临, 不仅是新的挑战, 也同时会摧毁两个世纪以来社会通过自保运动建立起来的“壁垒”, 而现实也在逐步应验他的预言: 不再局限于地区和国家, 而是在全球范围内, 劳工组织走向边缘, 工人阶级的社会待遇与生存境遇相对下降, 社会保险、养老保障、社区服务等社会权利也开始收缩^[11]。

于是, 针对波兰尼将19世纪市场社会在西方的兴起视为人类社会的“大转变”^[12], 布洛维提出了新的论断: 市场社会即将取得又一次的“短暂胜利”, 即第二次“大转型”^[8]。正如第一次大转型塑造了众多古典社会学理论、建立了现代社会工作实践框架那样, 第二次大转型也向当今社会学与社会工作提出了核心问题, 即如何在第二次大转变的挑战下实现社会自我保护? 对此, 西方社会学家给出不同的答案, 也就意味着作为社会学双生子的社会工作, 也需要重返本质, 找到理论旨趣和实践立场。

笔者认为, 对于结构取向的社会工作而言, 需要关注“双向运动”中社会的反向运动, 通过实践建构出“社会如何回应市场社会”的答案, 从“结构”的视角出发去理解“社会”本身的重要意义。从葛兰西的“公民社会”到波兰尼的“能动社会”, “社会”的线索越来越清晰: “国家”“市场”与“社会”的三元

互动框架中界定彼此,“社会”是在与“市场化”的搏斗过程中彰显自身的,在反对劳动力商品化的过程中,“社会”具象为工人阶级自身;在反对货币商品化的过程中,“社会”具象为所有维护社会权利的制度和主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结构社会工作需要重拾马克思的理论遗产,在第三波市场化(自然商品化)的过程中重新诠释“社会”的内含与外延。

面对市场化的入侵,社会的自保运动从来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需要找寻“社会行动的主体”。对此,笔者认为结构社会工作的未来取向,一方面有必要沿着阶级分析的路线,将阶级行动者作为焦点,分析变化着的社会结构如何造就了行动者的生活策略与选择,以及这种策略选择又是如何加剧或缓和了社会结构变迁,对中国而言,尤其需要关注承担着转型成本的底层民众,为边缘人群发声;另一方面,更需要在宏观逻辑的结构分析之下探寻发挥作用的微观机制,即分析不平等的具体发生条件与“实践情景”,以此才能发现改变现状的突破口。

(二) 从“反思实践”到“反讽实践”

1. 以反讽“去话语霸权”。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结构社会工作的勃兴与“去专业权威”的过程紧密相关。“后专业化”时代的西方社会工作理论更加强调知识来源的反思实践性,在实务创新的过程中倡导知识生产的分散化^[13]。按照郭伟和的分析,西方社会工作在后专业化时期经历了两次“去专业权威”的过程,第一次是以倡导“证据为本的实践”来为“权威为本的实践”和“经验性临床实践”祛魅;第二次“去专业权威”的过程则是在完善“证据为本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以“反思实践”来改造社会工作,即建立“批判反思实践”模式。

强调社会工作的“证据为本”取向旨在建立基于实证科学的临床实务模式,以此反对专家话语,增强专业实践效力。然而,用反讽的视角去审视近年来我国社会工作实务发展脉络,不难发现“证据为本”的实践同样没能解决实务过程中的话语霸权和权威关系问题:一方面,以工具理性和实证主义为指导的“证据为本”实践所生产出的“专业知识”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并且往往与复杂多变的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实践智慧产生冲突,在冲突过程中又倾向于使用实证模型来强化专业话语的效力;另一方面,这种专业知识通常是简化复杂环境的标准化工具,这种普适性知识并不适用于模糊不清的一线实务情景。因此,有学者甚至指出,证据为本的实践在扛着实证主义科技理性大旗来反专家权威的过程中,其自身又吊诡地建构出一种新的知识权威层级。

出现这种专业发展困境是因为,在社工实践中缺少“批判反思”的专业化努力往往会导致“去专业化”,既否认了知识来源的多维可能性,也否认了实现目标的其他路径。在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过程中,专业共同体围绕“学院知识”来安排社会工作的制度建设与人才培养,标准化实务流程逐步成为社会服务项目管理的中心,而成效为本的评估模型也极大缩窄了项目评价的视野,“此种单向度思维惯性,甚至会把我们的视野缩限到,仅在社工专业内部讨论去增强社工专业化,而形成某种增强专业化程度就能解决社会问题的迷思”^[14]。脱离于实践的理论 and 刻板的学院知识反而容易让社会工作者产生深度困惑,服务的人本主义逻辑被目标管理的工具主义所替代,最终成为堕落的天使。

实际上,学院知识与实践智慧是相互转化的连续统,任何专业活动的早期均是在实践经验的指导下借助实证逻辑将复杂日常情景抽离,而形成的抽象、普适性知识^[15]。在实践中将头脑中既有的学院知识和实证主义方法论悬置起来,对当前既有的实践经验进行反讽性的分析,或许应成为那些固守专业性的社会工作者的反思起点。

2. 社会工作者:成为“反讽实践”知识分子。实际上,社会工作界从不缺少批判反思的理论传统,只是以批判理论立身的结构社会工作长期以来只停留在宏观体制分析层面,缺少对微观个体和临床实践的关照。现有的“反思实践”指导下的社会工作通常指向案主,期望启发受助者反思其成长历程中的特定场域对其行为惯习的塑造过程,以此帮助受助者跳出结构性限制。

在此种意义上,“反讽实践”与“反思实践”是一脉相承的:反讽的任务是启发受助者自身发展有

关的多种可能性,去展示已经存在的结构并非不可避免,去指出社会行动的开放性结局。“反讽实践”与“反思实践”指导下的社会工作,都是将恢复社会功能的任务留给受助者自身,而不是告诉他们一个线性的问题解决方案和一组确定性的答案。

反讽实践比反思实践走得更远的地方在于,反讽性批判实践的目标是使受助者周遭的权力施展过程得以曝光,披露它混合的和偶然的起源,而不是试图命令受助者去做什么。在此种意义上,采用“反讽”干预的社会工作者,意味着通过增加受助者的反思能力来增进与他同样遭遇的人彼此之间的理性,致力于持续的群体内自我批判,以此实现个体增权与集体赋能。

因此,当前社会工作学界需倡导在“证据为本”的实践与“批判反思实践”之间走出第三条道路,使二者在“反讽实践”中达到平衡与互补^[16]。社会工作者需要将自己武装为“反讽实践”的街头知识分子,永远需要在“专业化”话语和“去专业化”话语^[17]之间采取反讽姿态,即保持反思和开放心态应对社会工作界出现的新话语与实践框架,既反对专业话语霸权对实践智慧的忽视,同时警惕反思性话语霸权的“无限怀疑主义”。

最后,本文在此参照新古典社会学赋予批判知识分子的使命,正在重建中的“结构”社会工作对反讽实践的社会工作者的希冀是:将改变的可能留给社会行动者自身,让他们自己去了解和衡量,他们是否愿意为特定的改变过程付出代价。换言之,反讽实践的社会工作目标,是使受助者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过程得以澄清,揭示它不平等的起源,也展现周遭优势的资源;不试图告诉受助者去应该做什么,而是问受助者的答案从何而来。在此种意义上,反讽实践的社会工作者通过增加受助者的反思能力来增进主体与他者之间的联系,以此维持沟通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 [1]孙立亚. 社会工作导论[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145.
- [2]何雪松. 迈向中国的社会工作理论建设[J]. 江海学刊,2012(4):140-144.
- [3]MULLALY R. Structural social work: ideology, theory, and practic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13.
- [4]FOOK J. Radical casework: a theory of practice[M]. Sydney: Allen & Unwin,1993:2.
- [5]EYAL G, SZELENYI E, TOWNSLEY E. On irony: an invitation to neoclassical sociology[J]. Thesis eleven,2003,73(1):5-41.
- [6]GOULDNER A W. 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 [M]. New York: Basic Books,1980: 2-8.
- [7]吉尔·伊亚尔. 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M]. 吕鹏,吕佳龄,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07.
- [8]BURAWOY M. The Sociology for the second great transformation[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2000,26(1):693-695.
- [9]克尔凯郭尔. 论反讽概念[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8.
- [10]刘森林. 反讽、主体与内在性——兼论马克思主义中的反讽维度[J]. 现代哲学,2006(5):18-27.
- [11]麦克·布洛维. 公共社会学[M]. 沈原,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66-78.
- [12]卡尔·波兰尼. 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 刘阳,冯刚,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12-15.
- [13]郭伟和. 后专业化时代的社会工作及其借鉴意义[J]. 社会学研究,2014(5):217-240.
- [14]赵环. 社会工作的实践迷思及其范式转型[J]. 学海,2016(5):126-130.
- [15]郭伟和. 迈向社会建构性的专业化方向——关于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道路的反思[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31-34.
- [16]HIGGINS M, GOODYER A. The contradictions of contemporary social work: an ironic Response [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2015,45(2):747-760.
- [17]雷杰. “专业化”,还是“去专业化”? ——论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两种话语论述[C]// 王思斌. 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第十一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25-40.



(责任编辑 彭何芬)